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80年10月
8
星期三
庚申年八月三十
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晴 偏北 二、三级
风 力 二、三级
夜间 晴 早晨有霜
雾 偏北 二、三级
风 力 二、三级
温度 最高 15°
最低 5°

职工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企业的权力机关

大丰林业局民主选举局长

规定任期3年，如不称职，职工有权提请职代会随时撤销其职务

编者按 大丰林业局职工代表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局长，规定局长任期为三年，如不称职，职工有权提请职工代表大会随时撤销其职务。这种作法对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办好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正在通过试点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权力将越来越大。把企业的自主权交给谁？既不是交给厂长、经理、局长，也不是交给党委书记，而是交给职工代表大会。职工群众是企业的主人，由职工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大会应当成为企业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有权讨论、审议、决定企业生产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有权监督干部的工作，也有权选举和罢免包括厂长、经理、局长等领导干部。这样做，有利于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办好企业，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新华社哈尔滨10月7日电 黑龙江省伊春林区大丰林业局今年7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了一名局长，又由局长提名、职工代表大会选出5名副局长，组成新的局领导班子。最近，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全部正式批准。

大丰林业局新组成的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为45、7岁，都是有实践经验的内行里手。他们上任后，朝气蓬勃，雷厉风行，使工作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积极进行体制改革，推行林工商综合经营，并改变了财务大包干的不合理制度，实行企业独立核算。

这个林业局的全局上下，都把这次选举局长当作一件大事。为了使选举能真正反映广大职工的意志，首先由全局职工评议局级干部，在此基础上酝酿候选

人。提候选人名单时，领导上不定调子，不划框框。全局七千多名职工，有五千人三百五十多人参加了局长候选人的提名，被提名的共有15人。接着，召开全局职工代表大会，会上338名代表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结果，原局长毛景春因懂生产，会管理，年富力强，以335票当选为局长。

为了把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破除干部制度上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局职工代表大会还规定：今后局长任期为3年；如不称职，职工有权提请职工代表大会随时撤销他们的职务。

大丰林业局的44个基层单位中，有11个主要生产单位从去年开始已实行了民主选举班组长、车间主任和厂长的制度。

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宣传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学习和发扬辛亥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统一战线，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同心同德，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会决定：

成立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纪念筹备的筹备工作。筹备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组成。

应南共联盟邀请前往进行友好访问

彭冲同志率党代表团离京

方毅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冲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南斯拉夫共产党主席的邀请，6日日夜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团员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中联部副



由先进工作者提拔起来的陕西省白河县邮电局副局长刘周顺，先后多次主动申请辞去领导职务，重新当上了乡邮员。去年他又一次被评为全县先进工作者，在质量月活动中，被评为全国邮电系统质量标兵。

群众称赞改革迎宾礼仪

国务院撤销新建迎宾场所的计划

编者按 我国政府实行礼宾改革，简化接待外宾礼仪，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不少读者来信发表感想。现在连登一封，信中建议停止在钓鱼台修建新的迎宾场所。据了解，国务院领导已撤销另建迎宾场所的计划。这说明中央领导和人民群众想到一块儿了。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我国领导人欢迎外国国宾的仪式改在大会堂前举行，给人面目一新之感。作为一个目击者，感想很多：

一、选择的地点好。大会堂是我国政治中心的象征，她本身庄严、雄伟，在此举行仪式，气魄大，比过去在机场更隆重。

二、不脱离群众。就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

和大批车辆往返机场的开支。

四、广场的布置和整个仪式庄严、朴素、隆重、亲切，非常得体；仪式用的时间也不多。这是一个很好的礼宾改革，希望能坚持下去。

但是，听说目前的方式只是临时的，准备将

来改在钓鱼台举行迎宾仪式，而且正在设计新的迎宾场所，可能还要花费几百万元。我国经济不富裕，该不该花这笔钱很值得研究，特别是改在钓鱼台，或许还不能收到在大会堂前这样好的效果。因此，要不要再搞新的迎宾设施很值得三思。

一个目击者

自动集结观看仪式，可使外宾感到亲切、自然。
三、节约了领导同志的时间



信托服务公司。这个公司以经营日用工业品为主，也代代销一部分农产品。它们通过广告宣传、

电话联系、上门服务、门市接待、举办展销会、参加物资交流会等途径，与市内外1,090个单位发生

购销业务关系。这个生活资料的信托贸易渠道，对沟通城乡和地区间的商品交流，调剂余缺，活跃市场起了积极作用。

——上海市小商品批发市场。这个建立于1964年的批发市场，近两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目前经营的小商品已有240个品种、二千多种花色规格。同它的七百多个外贸货栈建立

了业务关系，并且同二百多个社队企业签订了302份合同，为社队企业推销

7大类产品二百种工业品。

——上海市综合贸易

据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今天下午会见了马来西亚上议院议长敦·奥马尔·翁麟麟和夫人以及马来西亚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赵紫阳对马两国建交6年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他介绍了最近召开的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确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赵紫阳表示相信，翁麟麟议长和代表团的访问，必将使两国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翁麟麟向赵紫阳转达了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还转达了马来西亚议会和总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问候，并祝贺赵紫阳当选为中国总理。他说，马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的贡献。

赵紫阳请翁麟麟转达他对侯赛因·奥恩总理的亲切问候。他说，马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观点一致。他希望两国今后在国际事务中经常交换意见，协调彼此的立场。

赵紫阳会见比斯塔

据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会见尼泊尔首相基尔·尼迪·比斯塔和夫人。

赵紫阳赞扬比斯塔为中尼友好作出了很好的贡献。他代表叶剑英委员长，华国锋主席，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向比斯塔先生和夫人表示热烈欢迎，并且请比斯塔先生转达他们和夫人对比利斯塔的诚挚问候。赵紫阳说，中尼这两个友好邻邦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他希望中尼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发展。

比斯塔转达了比兰德拉国王对中国领导人的热情问候。他对两国关系一直在稳定地向前发展表示高兴，并祝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获得成功。

刘周顺重当乡邮员做出新成绩

中厂支局当乡邮员。通知下后，机关安排他

不让他，自己背着铺盖步行到支局报到。刘周顺重当乡邮员以后，工作干劲不减当年。他每天一早起床，背上干粮，背着一、二十斤重的邮包，翻4架大山，

过22条河沟，跑五、六十里山路，及时准确地把邮件送到70多个投递点上，一年四季，风雪无阻，从不脱班。两年来，他

没有请过一次病假，没缺过一次勤，没送过一次件，投递十五万份邮件无差错，使五十多封疑难信件有着落。他走千家门，送万户信，不仅为山区群众传信送报，带取包裹挂号，还为群众代

代购日用品和药物，做了大量的外好事实。群众赞扬说：“老刘是我们信得过的，靠得住的贴心人。”

本报通讯员



针对教师队伍不稳定、学生流动性大、入学率下降

云南省采取四条措施巩固农村教育

据新华社昆明10月7日电 云南省人民政府最近转发省教育厅的一个报告，要求全省各地重视解决当前农村教育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随着农村形势的发展和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当前云南省农村教育工作也出现了教师队伍不稳定，学生流动性大、入学率有所下降等新情况和

新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学校停办等现象。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几十所小学因民办教师和学生回家劳动而停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也有几十所小学因师生回家劳动而关门。针对这些情况，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了省教育厅提出的四条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加以解决。

（一）稳定民办教师队伍，落实他们的报酬和口粮。各地在建立和健全生产岗位责任制的过程中，要保证民办教师的报酬和口粮不低于原来的水平。为使民办教师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工作，一般不要给他们包产任务。国家拨给民办教师的补助费，仍应按原来的办法实行，任何单位不得克扣和挪用。任用和辞退民办教师，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以适应生产需要。现在农村政策放宽，一些家长要求适龄儿童回家放牧、喂家畜、带弟妹等，在办学形式上就不能继续搞一刀切，搞单一的全日制，必须根据经济、民族、人口、地理、气候等不同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办学。

（三）认真办好重点小学和公社中心小学。要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好一批农村全日制小学。每个县要办好三至四所重点小学，作为示范。公社要办好中心小学。有条件的地区一个大队或几个大队联合办好一所全日制小学。

（四）加强对农村教育的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各地、县，特别是县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农村教育的领导，及时研究和解决农村教育中的重大问题。

世界最新纪录。

大会名誉总裁判、世界航海模型运动协会主席莫里斯·费兰克在复检场地设施和运动器材后，同慕朝热烈握手，祝贺他的成功。

第三轮竞赛中，以10秒97（164.084公里/小时，噪声指标77.5分贝）的优异成绩打破了他在10月5日创造的12秒03的

世界最新纪录。据新华社广州10月7日电 浙江省航海模型运动员葛朝，今天在全国航海模型竞赛的A三级帆船（汽缸工作容积10毫升）

让联营企业各方都得利

恩平县合理处理利润分配比例，调动群众办企业的积极性

本报讯 广东省恩平县在联营企业的收益分配上，注意正确处理积累与分配的关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使社队自愿得到兴办联营企业的实惠，调动了社队群众办联营企业的积极性。

为了开发利用本地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近几年来，恩平县委组织县社队、社与社、社与队、厂与社等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企业，兴办起一批总装机容量达14,000多千瓦的水电站和一些建材工业企业。这些联营企业投产，盈利不少，有的能正确处理企业所得利润，注意分配兑现；有的只顾留利，扩大生产；还有的甚至把盈利挪作他用，使联营各方得不到好处。县委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联营企业是经济上的联合，不是行政上的合并。因此，合理处理利润分配比例，关系到能否调动社队办联营企业积极性和群众的经济利益，必须认真搞好。于是，这个县围绕联营企业的分配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作出了几条明确的规定：一是明确联营企业是独立经济核算单位，其收益均属联办单位所有，受国家法律保护，未经联办单位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挪用；二是根据按劳分配、等价互利的原则，各联营企业的收益分配办法，应参照参加联营的社队的实际投入、投物、投资的比例分成，多投多得，少投少得；三是联营企业收入，除去职工工资福利、管理、维修、折旧留成费用之外，所得纯利润，用65%还国家贷款和其他借款，35%分红，如已全部还清国家贷款或其他借

款的，企业，除留一成用作扩大再生产外，其余九成按照各联营单位应占分红比例计算分配。社队联营利润收入的分配，公社占10%，大队占20%，生产队占70%，把实惠分给群众。去年全县联营企业总收入533万元，利

帮助农民多得实惠

目前，农村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正在经过试验逐步发展。许多联办企业办得较好，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果。在农村广泛兴办联合企业，关键是要调动社队、尤其是生产队的积极性。生产队对经济联合积极性的提高，主要取决于联合企业能否合理分配经营成果，生产队能否从中得到实惠。广东恩平县在兴办联合企业中重视企业收益的合理分配，农民从联办企业里很快得到好处，这样，已经参加联合的社队积极性更高，迅速没有投入的自愿入股了，全县联合企业迅速增加到40个。这个事实说明，搞经济联合，一定要坚持自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要努力搞好生产和经营，搞好收益分配，使参加联合的农民增加收入。

前些年，许多公社、大队从生产队抽资金，调劳力，兴办社队企业。其中很多是办得好的。但是，也有不少企业，名为联合，实际上是变相平调：有的利润不向生产队返还；有的吃生产队的粮，不向生产队交款；有的光明正大不拨款。还有一部分企业，不能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只重视扩大再生

润254万元，各企业都按规定，及时兑现分配，据统计，各联营企业已下拨给社队分红数1777万元，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例如全县公社联办的水泵厂，按规定一年拿出10多万元分给社队。

恩平县社队联营企业兑现了分配政策，进一步调动了社队兴办联营企业的积极性。目前，全县已先后办起了小水电、建材工业、加工业、养殖业、补偿贸易等联营企业40个，由15个公社联办的第二水泥厂和铺地砖厂，最近又投入生产。

产，忽视给生产队分配收益。这样办“联合”企业，生产队出钱出力，却得不到多少好处，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势必挫伤生产队办企业的积极性。还有些国营企业，在与社队联办企业中，要生产队出土地、出劳力、出原料，生产获利之后，却不公平分配，农民得不到应有的收益，感到受了欺侮。这种建立在不合理分配基础上的联办企业，当然是难以巩固。

搞好联合企业的利润分配，这是关系每个企业、生产队和社员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是办好联合企业的前提。四川会理县凤营公社三年中三次调整利润分配比例，给生产队增加收益，联营企业办得越好。这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我们提倡在农村搞经济联合，是为了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恩平县委和会理县凤营公社的领导同志懂得这个道理，自觉地发挥联合起来的优势，坚持互利原则，帮助农民多得实惠，进一步促进了联合企业的发展。他们的这些做法，可供参考。



凤营公社是四川省会理县一个山区公社，三年前是全县的穷社之一。从1977年起，凤营公社在抓企业生产的同时，开辟了工副业门类，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联合兴办了马鞍山铁矿。到1978年，这个公社各业总产值就突破200万元。

凤营公社有钱了，他们又想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呢？头一年，虽然只开采了五个月，马鞍山铁矿产值就达到30万元。到第二年春天，一笔笔产品价格结付凭证，陆续送到公社。公社干部们心里开始琢磨：解放以来，这个公社多亏国家扶持，大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办起几项农业基本建设工程，至今限于投资，多数未能竣工。他们感到，有钱了，公社一级的分配不妨大一点，很快把那些甩尾巴工程配套竣工，让全社人民早受益了。于是，公社把铁矿收入入了个“四、一、五”分成方案（即：公社4成，大队1成，生产队5成），召集全社干部和社员代表来商量。初办企业，社员就得到利益，分配立即兑现，人人喜笑颜开。

第二年，除农忙季节外，常有几百人上山采矿。这一年的矿石产值突破100万元。在收入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分成呢？公社干部们想，全社的机械化还是空白。现在该买点象样的农机具武装一下，并相应的办一些企业事业。道理向大队、生产队一讲，再把收支帐一算：既能满足购置农机具和兴办

联办企业盈利后首先想到农民

凤营公社联办企业不断扩大生产队分成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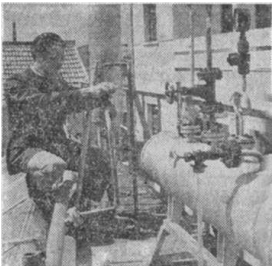
企业发展的需要，又能使社员的收入有所增加。于是，这年联合企业收入的分成比例，又调整为“三、一、六”，各队实际分配结果，全社平均劳动日值达到8角4分，各生产队并一次还清了多年积欠的13万元贷款。分配兑现那阵子，处处欢声笑语，供销社、信用社忙得不亦乐乎。公社添置了汽车、拖拉机、推土机、抽水机、打米机等农业机械，工效成倍提高；一座400千瓦的水电站动工兴建，输电线陆续架设到全社25个生产队。

70年代最后一年来到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和社员更关心、支持马鞍山铁矿了，矿部经过研究，实行了“五二三奖一惩”责任制，全矿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每吨矿石成本由3.3元下降为1.55元。这一年奋战，总产值高达172万元，纯收入近120万元。怎样分成的问题又摆到了公社干部们的面前。

从日常谈话中，人们常常听到公社干部们仍有许多雄心勃勃的设想。然而，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头脑冷静了，社员日子虽然好过些了，但同许多富裕地区相比，还只能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要真正搞好休养生息，就更需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尽快让广大农民富起来，应该有更多的收入直接分配给社员。大伙提出了“二、一、七”分成的新方案，立即被通过。这一年，全社平均劳动日值上升到一元零八分，生产队办联合企业得到的实惠更多了。吴远勋

让太阳能为生产和科研服务

江苏省海安县积极开发和利用太阳能为生产、生活和科研服务，先后研制了太阳能灶、太阳炉、热水器、育种器，以及太阳能浴室、温室、空调室等二百多台太阳能器件，其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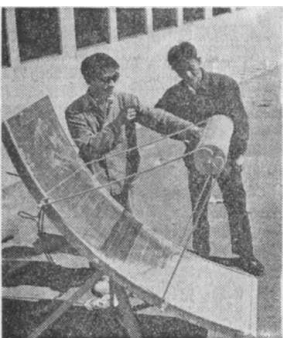


太阳能制冷空调设备可以使粮库内的粮食始终保持一定温度，防热、防霉烂、防虫蛀。

上图为海安县太阳能利用研究所科研人员在调节氨吸收系统的情景。

用太阳能育种。

种子（小麦、水稻、棉籽、玉米种等）经过聚焦脉冲阳光照射，具有提早成熟，当代表产及产生变异的特点。 杨一秋撰



青海推广切洛经验 放牧结合建设草场

据新华社西宁10月6日电 在最近召开的青海省草原建设会议上，介绍了藏族优秀放牧员切洛合理利用和建设草场，畜牧业连年高产的经验，并决定在全省牧区推广。

切洛是青海省同德县岔岔公社托士大队的放牧员，他作为集体包牧的一母羊，常年膘肥体壮，从1968年以来，连续13年创造了百母超百仔的高产纪录。切洛十分注意管好天然草场，他在山崖上修牧道，在激流上搭便桥，开发利用了过去未能利用的大片高山草场。他根据草场的类型和气候条件，合理安排，分片轮牧，选留足够的产羔草场，严加保护，不到产羔时间决不使用。切洛还尽自己的所能，因地制宜地改良天然草场、人工种植饲草。多年来，他发动全家人采集野生草籽两千三百五十多斤，每年在植被稀生的草场上进行撒播播种。仅最近5年中，就补种改良草场八十多亩。切洛一家人每年坚持打坝山间林地的青稞，在冬春草场的圈篱附近种植燕麦草三至五亩，1976年到1979年4年中，共青贮饲草142,000斤，大大增强了抗灾能力。切洛的出色成绩，受到了党和群众的称赞，他先后被选为五届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在全省牧区推广切洛的经验，对于解决畜草矛盾，促进畜牧业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好处：一、全省5亿亩天然草场就能得到认真保护、合理利用。二、就地使用肥料，就地收割、贮存饲草和进行补饲，提高抗灾能力。三、简便易行，花钱少，收效大，各类地区、牧民户都能推广。

为研究防治家猪寄生虫病提供新依据，开辟新课题

张顺祥发现两种家猪寄生虫新种

据新华社武汉10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詹德树报道：湖北省荆门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张顺祥，新近发现家猪小肠罗口吸虫和胃内狼旋尾线虫。

张顺祥今年48岁，1956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家畜寄生虫病的研究，1963年曾发现寄生于羊大肠内的结节虫新种，受到有关科研部门和专家的重视，确认这种寄生虫在世界上是首次发现，同时，根据张顺祥观测特征和写出的论文，将这种虫命名为“寄生于羊大肠内的湖北食道口线虫”。

张顺祥发现并研究家猪小肠罗口吸虫和胃内狼旋尾线虫是从1978年开始的。有一次，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家猪寄生虫，发现有两种虫子同其它寄生

虫不一样，有一种虫子身体弯曲，头部十分明显，腹吸盘发达；另一种虫体粗壮，虫体表面有数不清的细纹。这是两种什么虫子呢？张顺祥一时难以认定。事后，他翻阅了有关资料，才辨认出一种虫子为罗口吸虫，一般寄生于罗口和十二指肠；后一种虫子为狼旋尾线虫，在开始对这两种家猪寄生虫进行研究的课题。

张顺祥发现并研究家猪小肠罗口吸虫和胃内狼旋尾线虫是从1978年开始的。有一次，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家猪寄生虫，发现有两种虫子同其它寄生

虫，回到所里，逐条进行分类对比，共发现罗口吸虫和胃内狼旋尾线虫六百多条。于是，他又把把这些虫子一条一条地在显微镜下进行分体观测，并通过简易显微镜绘图，将这两种寄生虫的每一个器官绘制成图，再进行分析对比。大量的分析反证表明，这两种寄生虫确是两种家猪寄生虫新种。

经湖北省畜牧科研所和北京农业大学孔繁瑞等专家鉴定，张顺祥发现这两种家猪寄生虫新种，在我国不仅是首次发现，同时也是为防治家猪寄生虫病提供了新的依据，开辟搜集到一万多条家猪寄生虫



编辑同志：

我们农村养鸡、养猪，历来是有什么喂什么，有红苕就喂红苕，有苞谷就喂苞谷，这样养猪很不科学，饲料浪费很大。现在

农村社队能生产配合饲料吗？

有的地方为农民生产配合饲料，实践证明效果确实很好。这些地方的农民普遍反映，吃了这种配合饲料的猪，平均每头每天增重量都比没有吃这种饲料的猪高1倍多。看见这种情况，我们也想拿粮食换配合饲料喂猪，可就是换不着。例如龙会公社粮站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所生产的配合饲料，由于原料不足，只供应附近的十多户生产队。我们很想搞生产这种复杂配合饲料需要什么主要原料、生产方法是否复杂。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能够自己生产。

四川威远龙会公社 周星明同志

农村社队能够自行生产初级配合饲料和混合饲料。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不少地区的粮食和饲料部门在发展饲料工业的同时，积极帮助农村社队建立配合饲料加工点。以江苏省为例，到今年6月份，全省各粮食部门帮助社队改建和新建的配合饲料加工点（点）有572个，共生产配（混）饲料两万多吨。这些饲料厂（点）都是社队自筹资金，利用原有的粮食粉碎设备建起来的。粮食部门主要是帮助设计和供应部分设备，提供配方，进行技术指导。

大量事实说明，因地制宜地发展社队配（混）饲料加工，符合我国目前农村经济特点，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加工，就地使用，减少运输环节，降低饲料成本，增加集体收入，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好处。

生产配合饲料或混合饲料的原料，要根据当地资源就地取材。江苏吴县越溪公社一大队加工混合饲料的主要原料是大麦、稻谷、玉米、渣糠、麸皮、菜籽饼、鱼粉、骨粉和食盐等，其中粮食占一半左右。如皋新民公社十五大队加工的初级配合饲料，在玉米、大麦、麸皮、棉籽饼、菜籽饼、蚕沙、猪血以外，再添加一定比例的蛋、蛋壳、贝壳、土霉素渣和硫酸亚铁等，其中粮食占30%左右，但能量和蛋白质成分都大大提高。

《饲料研究》编辑部

海上“牧场”

——记山东文登县的对虾养殖业

我国著名海藻学家曾呈奎教授1977年在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说：“人们总以为‘大海茫茫，资源无限’，‘有水就有鱼虾贝藻’。却不知道：水里捞金的一天比一天多，海洋资源就一天比一天少，特别是在近海。我们不能听天由命，靠天吃饭。我们要改造大自然，大力发展养殖业，把我国海域建成稳产高产的‘海洋农、牧’！”

曾呈奎教授的话说进了水产工作者的心坎。若干年来，我国的水产养殖工作已经有了一些成绩。现在，大伙儿在大海种地、放牧的劲头更足，海上农场、牧场年年在扩大，光是对虾的养殖面积已由1978年的2万亩扩大到15万亩。山东文登县南、北两面靠海，海岸线有180里长，滩涂水浅，口小肚子大，筑一道小堤，就能围出一个大池，贝类、藻类很多。沿海各社队经过多年试验，大力养殖对虾，取得很大成绩。到今年春天，这里放养的虾苗1亿多尾，总产量预计可达全国的四分之一。

后岛大队走在前面

后岛大队西面有个五垒岛湾湾，是文登县最大的河流母猪河的入海口。每年清明前后，对虾成群结队游来产卵孵化。

早在1956年，有位老渔民捧着几只小对虾对农业社的干部说：“能捕到小苗，不愁养不出大虾”干部们一合计，带领社员修了一个30亩的虾池，捕了30万尾虾苗放进去。没有想到：8月里一场大雨，冲垮了虾池，虾苗跑光了。第二年，池地填高了，却忘掉了警世名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苗”。结果虾苗被鲢鱼、鲈鱼吃光。第三年清池除害，养虾成功，对虾在池里蹦高跳远，水花四溅。社员舍不得马上出池，想等虾再长大一点。谁知天气一冷，水温一低，对虾扎进池底取眠，在稀泥巴里死掉了。当时有人说：“虾是龙王宫里来的，凡人养不了。”再加上社会上刮“五风”，人心惶惶，谁也没心思养虾。

1968年，山东海洋学院180多名师生到后岛接受“再教育”。大队支部书记曲衍行听说了喝海水的教

授，不避嫌疑，去向他们请教。张明赞、陈大刚、王克行等老师不愿出面露面，就在背后出主意，帮大家总结过去失败的经验。这一年，30亩虾池收虾790斤。社员们高兴了，一齐上阵，筑了一条大堤，建池500亩。从此，后岛大队的对虾年年增产。1979年，这里产虾55,020斤，平均亩产110斤。目前他们正发动社员养蚯蚓，给对虾提供更多的饲料。

埠口虾场人工育苗

前些年，文登县的虾苗是从海里捕捉，靠天吃饭。1979年，苗情不好，文登县出动100多条船，10多辆汽车，忙了一个半月，结果捕捉的虾苗很少，还小不齐。虾苗十分娇弱，几经折腾，死亡率很高。县水产局于仁仁对大伙儿说：“要大量饲养虾，又要保护好海洋资源，虾苗还要达到早、齐、足、纯、壮，就要走人工育苗的道路。”

去年秋天，埠口养虾场开始建设室内、室外孵化池、育苗池、蓄水池，充气机房等等。今年春天，放进去18,000只虾卵，让它产卵孵化。经过两次失败，终于育出虾苗8,500万尾。只一年功夫，就解决了全县所需的大部分育苗。国家水产总局要求各地在1985年做到虾苗全部自育，看来文登县可以提前完成。他们争取在不久的将来，能把多余的虾苗投进海里自然生长。

人工养虾当年收获，养殖期只有120天左右。如果不及时出池，对虾又会冻死。县水产局局长时立堂想：要提高对虾的产量、质量，就要想法延长养殖期。

前几年，这里利用温泉地热泵孵化淡水鱼苗成功。能不能根据这个道理，搞对虾安全越冬，以便提前产卵孵化呢？1978年冬，他让青年技术员孙世民在温泉搞试验，失败了。去年12月，孙世民再接再厉，

和其他同志一起，把69尾捕来的亲虾放在用温泉地热泵调温的海水里，日夜观察，精心照料。结果有40尾亲虾安全越冬，其中30尾在今年3月下旬产卵，4月上旬育苗40万尾，比自然虾苗提前近两个月。到8月底，长到14厘米左右，比未越冬的对虾几乎要长一倍。

小观盐场一水两用

小观公社盐场原先也是靠天吃饭，潮水大时，有水晒盐，遇到小潮就要干涸。1978年，建了一个2,000亩的蓄水池。盐场职工利用这个蓄水池又晒盐又养虾。原来春、秋两季是晒盐的忙季，夏季不晒盐，正好是养虾的时候。这样，晒盐、养虾两不误，职工一年四季有活干。同时，盐田天天要从蓄水池提水晒盐，蓄水池天天要从大海纳进新水。库水活起来了，正适合对虾生长。去年秋天，闸门一开，网起了9万斤对虾，卖了18万多元。职工们个个欢喜，说：一池清水捞两次钱，还愁富得不快？

科学生产资源无穷

文登县的对虾养殖业，从规划、设计、测绘，到孵化、育苗、饲养，都滴进了科技人员的心血、汗水。水产总局黄海研究所的金文灿，多年在这里，一边进行科研，一边指导生产。1978年，他领着大家搞了4个试验池，各有2亩，每亩放苗5,000尾。秋后，最高的池亩产1,102斤，最低的亩产822.5斤，4个池平均亩产976斤。而全县去年平均亩产才52.3斤。

金文灿说：“养殖是水产工作的必由之路。全世界已有46个国家在养虾。我国大面积养虾只有3年历史，今年总产量已超过最先行的日本。但是我们的亩产量太低。这说明养虾潜力很大，前途很光明。靠龙王献宝，所得有限，搞科学生产，资源无穷。”

本报通讯员 于拥勋

本报记者 刘衡



桥陵间气挺人豪，秋水襟怀松柏操。
玉篆家风天此醉，文山遭遇节尤高。
誓将热血培民主，唤醒睡狮吼怒涛。
告慰先生应瞑目，千章红叶满晴皋。

1947年10月7日，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杜斌丞先生，在蒋胡匪帮的屠刀之下壮烈牺牲了。曾经与杜先生密切交往、共同战斗过的林伯渠同志于1948年10月写了上述首悼诗。

在为实现中国民主革命长期斗争的斗争中，杜斌丞先生与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那秋水般纯净的革命品德和松柏般不屈的献身精神，时时引起我们的深切怀念。

“革命的教育家”

杜斌丞，陕西米脂县人，生于1888年。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在京学习时期，他痛感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怀着爱国主义的热爱，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主张深表赞同。

1917年秋，杜斌丞回到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陕北家乡，任榆林小学学教主任兼地教员，次年担任校长。榆林中学当时陕北23县仅有一所中的一等学校，由于创建伊始，沿袭旧制，读经尊孔，死气沉沉。杜斌丞苦心擘画，锐意革新，联系各方，筹措经费，扩建校舍，购置教学仪器。为了筹开开支，他自奉俭薄，每月只拿30元到50元的薪金；而为了开创新的学风，提高教学质量，他以每月70元到130元的优厚待遇，从北京聘请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人士魏野畴、李子洲（魏和李是陕西我党组织创建人）、王森然、朱秋秋，和地上有声望的学者杜斗垣、李鼎铭、高竹轩等来校执掌，分别讲授新文化运动、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等课程。由于学校倡导学生自由思想，自由辩论，学术组织相继成立，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全校生气勃勃，面目一新。成为陕北最早推行进步的文化教育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学府。杜斌丞积极提倡并大力资助学生外出深造，投身革命。刘志丹、霍世杰、谢子长等一大批人都是从榆中肄业或毕业，外出投考军事政治学校的。他先后帮助筹办了绥德、延安、米脂等地的师范学校、中等学校和榆林职业学校，推荐了很多榆中学生分赴陕北各县，促进男、女完小的创建和地方教育的发展。

十年树人，成绩斐然。周恩来同志说杜斌丞是“革命的教育家”，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站在长线上”——走共产党的道路

在大革命的影响下，杜斌丞越来越不满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军阀统治，几次出外考察，1927年2月他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前赴西安，参加西安解围庆祝活动。在那里，他参加了陕西各界组织李大钊出殡，出席了冯玉祥的军事扩大会议，积极支持冯玉祥出兵潼关，会师郑州，策应北伐。他经常和中共陕西党组织的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刘少奇等，以及共产党员黄万平、杨明轩、刘志丹、刘念初等在一起活动。还多次会见冯玉祥部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和冯玉祥的苏联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费福林等人。这使他眼界大为开阔，政治思想起了深刻变化。他对学生们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他自己首先“站在长线上”，而且坚持不懈，至死不移。

这年杜斌丞还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考察。他看到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也目睹了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革命工人的血腥镇压，更促进了他的革命思想的发展。在上海，他曾随海两参战去苏联，由蒋介石“清党”，受阻未成。后来的两三年间，他寓居南京，除协助调查水利事业，顺济陕北灾民等活动外，精心读书，研究国史。他曾对友人说：“中国没有因为民国而进步，民国却因民国而遭难。”又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崛起”。

访“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

《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同志在哪里？十年浩劫，他经历了哪些磨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他又是怎样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呢？

最近，我访问了吴运铎同志。老吴把我让进他的卧室兼工作间，室内南墙临窗一张书桌上，放着画框板、丁字尺、三角板和制图仪器，书桌对面是一张钳工工作台，台上摆着台钳、手摇钻、锉刀、斧锛和五金器具，还摊着几张图纸，特别引人注目。坐下来后，我劝老吴说：“身体不好，要注意休息。”老吴却说：“现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群众时间不够用，哪还有心思在病床上海打牙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江青一伙将50年代给青年人以深刻革命的革命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打成毒草，给老吴扣上了“走白专道路”、“不讲阶级斗争、鼓吹个人奋斗”、“反动阶级”等罪名，遭到抄家、游街和批斗，关进了牛棚。在风雨飘摇的时刻，老吴想起战争年代，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他和战友们刻苦钻研技术，冒着生命危险，用血肉和生命的代价，获得制造枪炮弹药的技术和经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了自己的工厂。解放后，党派他出国学习，鼓励他成为精通业务技术的专家。今天虽被关进牛棚，他相信阴霾一定会过去，为了明天，还须继续占有知识。

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

马文瑞 刘澜波 王炳南 孔从洲 常黎夫

起，而人民群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这期间，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政治愈加黑暗，人民陷入更深的苦难。1929年，河北省主席徐永昌曾邀请杜斌丞出任职务，他对友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婉词谢绝。

倡议“西北大同盟”

1930年秋，杨虎城率部入关主陕，电邀杜斌丞由北平返陕，从此杜成为杨的重要决策人物之一。

杜、杨早年结识，并有深交。1922年赴西瑞国军失败，杨虎城部退到榆林，因慕名拜访了杜斌丞。后由杜介绍杨与魏野畴相识。魏对杜、杨的思想起了很大影响，也为魏、杨之间和杜、杨之间后来的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杜斌丞初到陕西，对杨虎城部入关后酒色淫奢，安逸享乐的倾向，大为不满。本想离去，经李季亭挽留，终于向杨虎城推心置腹地说明，这次回陕，“要治陕，不是为了作官”的宗旨，从而言归于好，协力共事。杜斌丞在公开讲话中常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古训为戒，历述辛亥革命以来陈树藩、刘镇华、宋哲元等军阀的恶行，希望十七路军一部要励精图治，在陕西有所作为；并且提出首先要抵御蒋介石瓦解解吾并异的独裁统治。他说：“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由此产生了杜斌丞、杨虎城和邓宝珊三人谋取甘肃、宁夏、新疆，联络青海的意图，即后来广为传说的所谓“大西北主义”。杜斌丞当时的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24个字。他还形象地说这是“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和“关上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

为此，1931年7月，杜斌丞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身份，赴甘肃各地考察。联络和争取甘肃地方各股武装力量，同杨虎城建立了关系。同年11月，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由四川窜入兰州，甘肃保安司令雷中田发出拥吴出山，主持大计的通电。蒋介石为形勢所迫，不得不借杨虎城部入甘平乱。杨策派所属部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进军甘肃，杜斌丞以高级参议身份随军入甘。由于地方武装势力的响应和配合，一月而攻克兰州，赶走吴、雷。孙蔚如出任甘肃宣慰使，杜任秘书长，襄理省政。

1932年4月，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9月收买了驻天水城的杨部警备师长马青俊反蒋，迫使孙蔚如部撤出兰州，移驻天水。蒋得手甘肃之后，对杜斌丞许愿封官，尽力拉拢。杜斌丞嗤之以鼻，拂袖而去。

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蒋介石控制甘肃后，以追击红军为名，命令在甘肃天水的孙蔚如部和陕南的杨部嫡系胡宗南部互换防地，把杨虎城在甘肃的军队全部赶到“剿共”前线。这时，杜斌丞明确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博得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

1933年春，杜斌丞推荐孙蔚如部参谋武志平代表杨虎城部，与在川陕边区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通江地区会晤，取得联系。从1933年至1934年之间，双方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从而使得四川方面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之敌，并由陕南得到一些医药和急需品。

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11月间，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同志派汪锋同志为代表，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行前周恩来同志嘱咐汪到西安

可是不允许有给他分配工作。老吴是从来不肯浪费时间的。他在室内支起画板，布置了小车间，自选两个研制新型武器项目，不声不响地干了起来。查阅资料、绘制图纸、制作模型，一天工作下来，常常眼睛熬出了血丝，手磨磨出了老茧，有时他心胸闷疼，起身走几步，继续干。

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给老吴彻底平了反。他出席了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1978年，老吴重新工作，担任了五机部机械科学部副部长。他分工领导一项重要科研项目配套的工程。他不顾年老体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次去贵州，一次去杭州，一次去上海，两次去成都，三次去西安，三次去沈阳。他深入工厂、车间，向技术人员和群众请教，开会商讨、解决问题。今年元旦，老吴是在从沈阳回北京的途中度过的。配套的科研项目完成了，老吴却病倒在出差的旅途中，不得不不住医院治疗。

在业余时间，老吴拿起笔，写作和修改了十几篇有关青年思想修养和文章，用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教育青少年树立革命理想和正确的教育。

谈到今后打算，老吴说：“还是那句老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一切献给党”，根据我年老体弱，精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我已请求将领导职务交给年青富力强同志担任，自己当顾问，但在有生之年，我仍将拿起笔来，继续革命一战，为四个现代化竭尽所能。”

本报记者 鲁南

先找杜斌丞先生。杜对党的重任尽力赞助。12月，我在西安成立秘密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开展西北群众救亡运动。杨虎城委托杜斌丞负责和支持支部的徐彬如、谢华等同志联系。杜积极掩护和支持他们的活动。杜还介绍了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我地下党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杜斌丞和东北的革命人士、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他认为西北军与东北军“联合则生，分裂则亡”，坚决主张“西北人民要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对张、杨之间和西北军与东北军团结互助的关系起了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第二天，杜斌丞就接任了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承担职务，联系各方人士，积极推行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促使全省政令统一，秩序井然。他还代表杨虎城方面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由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方面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曾多次和他单独晤谈，交换意见。他很快接受了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认定“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喊出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响亮口号，在许多地方人士中起了积极作用。正如南京中央通讯社所评，在党外人士中“首先接受党的主张的总是斌丞！”彭德怀同志也说：“有识之士，就是那个杜胡子（斌丞）！”

西安事变后，尤其在杨虎城被迫出国后，杜斌丞对十七路军的团结和前途至为关怀。他常亲自和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人共商部队的抗日和教育问题，他要求部队一定要和八路军加强团结，坚持抗战。抗战胜利后，他多次对孔从洲语重心长地说：蒋介石打胜了，绝不能参加；万不得已时，要当机立断。为这支部队以后起义走上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衷心拥护新民主主义

1937、1938年间，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杜斌丞任秘书长。他和当时我党代表林伯渠同志建立了良师益友般的深厚情谊，并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历任负责人以及我党陕西省委，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在国共两党商谈陕甘宁边区划界和八路军在陕北驻防地区时，他从中共做了对我党有利的工作。他积极争取陕北内战第一线上的国民党军高桂滋、高双成部。他对许多地方工作同志支持苏、徐彬如、谢华等，在工作上、生活上尽力给予帮助。他从危难中解救侯外庐等同志，使之免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在这之前，他曾对被敌人逮捕的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等同志和处于困境的谢子长、马文瑞等同志给以积极的营救、掩护和资助。他对平津失守后流亡未归的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十分关切，用省政府名义收容接待，给予充足路费，分别送他们回家，或去延安，或赴敌后。

杜斌丞在省政府举办的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的第一次讲话中，响亮地喊出：抗战到底，一定胜利。他针对国民党说：“党派（指国共两党）已经形成了坚强的抗战阵营，作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决策。这个阵营，这个战略是不允许破坏的，也是任何人破坏不了的。”他还引用宋之问，亡于汉奸弄权，明之亡，亡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教训，要大家警惕汉奸、卖国贼阴谋。杜斌丞的讲话振奋了人心，打击了投降分子们的阴谋活动。

1938年秋，杜斌丞卸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务，虚应省政府参议兼义。蒋介石对他极力拉拢，要胡宗南登门拜访，表示殷勤，并以军事委员会参议之职，按时酬劳高薪。杜斌丞“富贵不淫”，断然拒绝。国民党省党部两次送上国民党党员入党登记表，他两次撕毁。我党同志曾问他何以这样作呢，他回答说：“共产党，组织决定加入国民党，可以是假的；如果我加入了，假的也被他们利用为真的了。”

杜斌丞勤于学习，善于独立思考，常常能提出自己的见解。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老吴就亲自送他一本，两次约谈心得体会。1940年，张彬如同志由延安赴南方，路经西安，特意送他一份还是党心文件的《新民主主义论》讲话稿。他闭门谢客，精心细读，异常兴奋，到处宣讲：“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

为抗日民主运动坚贞奋斗

1940年6月一个深夜，国民党特务闯入杜斌丞家中，以搜捕共产党为名，抓走家里的佣人和客人。他愤而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不上衙门，不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从此以后，他专心致志于抗日民主运动，南北奔走，为促进西北与西南民主运动的结合，发展后方的民主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1940年，他先到桂林，与李清深、朱璠山、李任仁等人商谈西北团结、坚持抗战，推动民主运动的工作。后到重庆，加入了当时秘密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后来的“民主政团同盟”。1943年，当他由重庆到昆明，当时盟盟组织在昆明已经公开。他与华岗、周新民同志密切联系，与张奚若深交，并参加了当地的民主活动，广泛接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一些著名人士，结识了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曾昭抡、费图南、罗隆基、潘光旦、马素陶、杨春洲、张天放等人。他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斗争精神和八路军英勇抗战事迹翔实地告诉大家；同时慷慨地揭露蒋介石、胡宗南在西北的黑暗统治，闻之者耳目为之一新，无不感动。他在昆明期间的活动卓有成效。这年冬天，他到成都与盟盟主席张澜会晤，针对盟盟内部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状况，向张澜明确表示：青年党不是民主党派中的一支力量，它靠不住，对它们不可信任；要很好地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党、推动盟盟向正确的方向走。

1944年10月，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人成立盟盟西北总支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2月，正

式成立了盟盟西北总支，提出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吸收盟盟标准，拒绝托派分子和其他政治面貌不清者入盟。到1945年底，西北盟盟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陕西的二十多个县、市和甘肃、宁夏等地建立了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杜斌丞、杨明轩促使《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联合版，杜任董事长，使两报联合版成为很有影响的西北盟盟机关报。在这一切活动中，他十分注意依靠党的领导。他在盟盟内部讲：“西北盟盟唯一有利条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得到党的有力帮助。盟盟必须依靠中共的领导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1945年，蒋介石采取“调虎离山”的阴谋手段，妄图把杜斌丞调到重庆庆福来，委以军务委员会参议，卑躬伪善，一再接近。杜斌丞正不阿，仗义执言。他痛斥时弊，畅谈民主为人心所向，国命所系，不容抗拒。这就是董老诗中说的“共推国士谋能断，屡作罪言安复危。”

1945年10月，盟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杜斌丞被补选为盟盟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盟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次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开幕，杜以盟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他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竭诚拥护我党主张。许多进步人士称赞他是真正、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许多人希望他留下来，共同从事民主运动，也担心他回西北会出危险。但杜斌丞表示他是西北人，离开西北对革命的作用就小；西北需要人，再危险也要回去。他还特别对我党领导同志表示：“国家到这个关头，我怎么能够坐后方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了敌人。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我应该回去！”

坚持斗争 终以身殉

1946年2月间，杜斌丞从西南回陕，立即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宣布他决心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斗争到底；揭露国民党当局对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是不甘心的；指出今日世界和中国，民主潮流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只要大家促进民主宪政之实现，谁也阻止不住。

杜斌丞的公开谈话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也激怒了蒋、胡匪帮反革命的心窝。他的居所周围布满了特务，跟踪、盯梢，寸步不放。我党领导和许多朋友要他或去陕北，或赴香港；盟盟总部也邀他去南京去，但他认定他的去留应取决于工作。他说：“蒋介石在关中屯集重兵，关中心所受受害达于极点。为了个人安全把已进行的解放工作半途而废，对不起关中心父老，也不对不起共患难的同志。”他镇定地告诉亲友说：“革命不能因恐怖吓倒，斗争难道有怯懦！”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害，杜斌丞当然不遑，怒斥敌人：“李公朴、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决不能毁灭真理，我们只怕没有人来发扬真理，并不怕蒋介石毁灭真理。”

1947年3月21日，胡宗南侵占延安的第二天，就截断通讯，逮捕了杜斌丞。在敌人牢狱之中法和法庭之上，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痛斥特务截断通讯的鬼蜮伎俩，说明内战的爆发，应由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负责。杜斌丞十分关心怀同时被捕的同志，通过看守牢卒的士兵，转达了他写的《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五律一首：

国家首多难，南寇冠到此城。
望门思张俭，慷慨慨生情。
我志非石转，雄心似月明。
衷怀诚恒恒，自足慰吾情。
他关注着时局的发展，系念着盟盟的工作。当他得知解放战争威逼延安的消息后，赋诗赠词，情留保留，残缺不全。其中一首七绝仅存的后三句是：“汉家旌旗满汉关。为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一首五律今存的后四句是：

“人恨秦暴虐，群望汉旌旗。我有擎天手，与子以为期。”

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蒋介石图穷匕见。10月7日，杜斌丞先生在西安的玉祥门外慷慨就义，终年60岁。噩耗传出，在全国广大进步人士中激起极大悲愤。中共发言人严正揭露了蒋介石匪帮的反动屠杀政策。盟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将案情诉诸全国和全世界。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董必武、彭德怀、贺龙、吴玉章、谢觉哉、习仲勋、沈钧儒、柳亚子、高崇民等许多党内外领导同志和著名人士写了诗悼、悼词、挽联等悼念文字，赞扬他力争民主的丰功伟绩和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远在香港的柳亚子先生也写悼诗，倾诉了人民的愤慨：“桃李春风恩未逮，诗人抱恨九原危。临安三字沉冤狱，构桧无端杀岳飞。赤心也预告了历史的宣判：‘一炬成灰阳期不远，尽歼丑虏报仇来。’”

就在狱前两天，杜斌丞不省出狱中写诗：“自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虽在牢中，个人死生，已置诸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挡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

1948年10月7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在延安举行了隆重追悼杜斌丞先生殉难一周年大会，当时正在指挥向蒋胡匪胜利进军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写的挽词是：

秦峰巍峨，悼先烈舍身成仁，光耀耀，永垂不朽；
黄河怒吼，悼三烈气贯长虹，直捣长安，胡贼难逃。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1952年12月21日，杜斌丞遗体安葬西安革命陵园。

杜斌丞先生的一生，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英勇奋斗的一生。早在1937年，毛泽东同志就称赞他是“中国同志忠实的朋友”“一些老同志颂扬他是‘非党的布尔塞维克’。杜斌丞先生的确当之无愧。



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赵丹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能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必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夺权”。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觉。以后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管到什么程度？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栽秧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的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只只剩八个裤带，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教育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作了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尚看——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

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损害文艺。

每一级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家们才是眼耳鼻舌心俱全的甚甚众生了。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懂文艺的外行来领导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时，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蹒跚地地步，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而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速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勉强建议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文章作为范文？我们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今什么文艺史上，尊一家而要黜百家者，必不能没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民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改革。“体制”二字，我们文艺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

家，象我们这般的，文艺领域中，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谁，因为对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人和妇女等），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耗住那么多非业务干部来管文艺家们呢？有些非业务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秧插秧”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靠文艺创作发言，各有一番见解，难于求得统一。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40年试镜头以来，胡闹过又删，删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梗概”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文艺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遣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今来没有过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什么坏处？……

（80年9月于病床上）

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也谈“写真实”这个口号

郑伯农

报刊上对“写真实”这个口号有争议。有的同志不反对现实主义，但反对“写真实”，他们认为提倡“写真实”就是使文艺创作走向邪路。我想，如果取消了写真实，那么现实主义也就被彻底搞砸了。

“写真实”这个口号是斯大林提出来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现实主义的思想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的理解，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两个真实：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和真实地塑造典型，也就是细节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统一。当然，现实主义不等于写真实，它也不要求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还要创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还要讲思想性和艺术性，等等。

一些同志以为，提倡“写真实”就意味着排斥文艺的倾向性，这个结论未免武断。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所谓真实，是指作品的艺术描写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所谓倾向，是指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和评判。真实性和倾向性应当是根本对立的，进步的思想和倾向性应当是一致的。只有忠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才有可能对社会现象作出公正的评判；只有对生活持正确的态度，方有助于正确地、深入地反映现实。真实性不能代替倾向性，但是坚持真实性有利于产生正确的思想倾向，因为对生活的正确评判只能建立在忠于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所以我们提倡“写真实”，并没有用它去取代文艺创作的其它要求，更没有用它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总口号和基本方针之下，完全可以就某一方面对文艺创作提出具体的要

求。象我们这般的，文艺领域中，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谁，因为对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人和妇女等），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

要死死耗住那么多非业务干部来管文艺家们呢？有些非业务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秧插秧”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靠文艺创作发言，各有一番见解，难于求得统一。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40年试镜头以来，胡闹过又删，删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梗概”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文艺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遣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今来没有过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什么坏处？……

我们县有个剧团，是集体所有制单位，过去除国家给一定补贴外，主要靠演出收入，在经济上不能自给，被看作“包袱”。演员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练功没有场地，住宿条件也差，再加上主要演员和一般演职人员收入差不多，演、职员积极性长期得不到充分发挥，怎样管理好这样的县剧团呢？过去，我们总是希望于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近一两年来，在全国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和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推动下，我们开始想到，在文艺团体中，也有个解放思想、搞活一点的问题。去年冬季，县剧团提出实行分队包干、提成奖励的办法后，我们决定支持他们试行。把七十多人的剧团分成两个演出队，演出的收入由团、队按一定比例分成，队里分成所得，扣除各种包干费用外，留作奖励演、职员和队里积累。在试行过程中，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进一步确定了比较合理的分成比例，较好地处理了团、队和演员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同时，要求剧团在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培训，提高演出质量，从今年上半年实践看，实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显著。由于分队演出，相互之间有了竞争，演出队在选择上演剧目、安排演出线路等方面有了自主权。演、职员个人的物质利益和队里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因而大大调动了积极性，人人关心提高演出质量，节约开支。

在剧目创作上，更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来领导。统得过死，干涉过多，都是错误的。近三年来，我们改变了过去由党委主管干部少数领导人定本子的做法，采取了领导、作者和群众三结合评议本子的办法。1978年我县组织业余和专业作者共写了14个小剧本。初稿拿出后，组织业余和专业作者用一个月多时间，对14个本子——进行评议和修改。业余作者王巨臣写了一个反映商业战线改善经营作风的小剧，名叫《改得好》。讨论中不少同志认为这个本子有戏，但也有部分同志认为这是个揭露戏，不能演。我们引导大家就这个题材展开争论，最后大家都同意文艺作品应当积极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认为《改得好》这出小戏，批评了生猪收购员的错误的经营作风，又写了他的转变，写得生动活泼，能给人以启发，为进一步提高这个本子，我们又发动剧团的编写人员和演员们参加修改，收到了更好的舞台效果。在参加演出地区会演时，获得了创作二等奖。对他们整理的传统戏，观众中有争议。我们除听取观众意见外，并到剧团召开座谈会，和剧团同志一起评议剧本，对剧本中明显的糟粕部分和不合理情节，谈了自己的看法。对剧本艺术上比较粗糙，情节上有某些漏洞就不去求全责备，让剧团在演出过程中自己去修改提高。

要求做到细节真实和本质真实的一致。斯大林提出“写真实”的时候，就要求作家写出“使生活走向社会生活的东西”，那

种抓住生活中某些现象进行无限夸大，无限渲染的东西，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它们不是真正的“写真实”。比如《调羹》这样的作品，它的某些细节确实有一定的生活根据，能够给人以一定的真实感。但是这些细节所构成的画面不是真实的。在这篇描写写作的特定环境里，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尔虞我诈、互相利用、互相损害的关系，群众群杂的人是这种，受过欺压的人也是这样；反面人物是这样，正面人物也是这样，就连济南的一个普通农民，也要穿着花招欺骗人，似乎人们不拿一套混世术，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下去。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对某些干部来说，情况确实是十分严重的。但是控制权力的部门，决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对于这样的作品，应当坦率地指出它的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不应当把它的出现归罪于强调文艺的真实性。“写真实”和自然主义是两码事，不应把二者混淆起来。

列宁曾要求作家写出“最真实的、最实在的、最有宝贵实际内容的优秀作品”。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承认真实，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回避真实、害怕真实道理呢？但是在我们的文坛上，“写真实”居然被批评了二十多年。由于连续不断的批判，它被蒙上了污垢，面目可怖，以至到“四人帮”近四年了，虽然进行了猛烈反污，仍有一些同志对它心怀厌恶，白眼看。现在，应当掸掸泥污，涂去污垢，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丹晨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本

质并非就是光明，他的依据是什么呢？理由是列宁说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而“列宁说‘某些本质的方面’，正好说明本质并非只有一个”。我觉得丹晨同志是误解了列宁用语的涵义。一个事物的统一本质可以有多个方面的表现形式，并不是说这统一的本质的本质可以分割为几个不同的本质。某些本质的方面与“本质”并非只有一个”，这在概念上是存在着本质关系。丹晨同志的结论是用大概念代替小概念得来的。但是这种论证在创作上与文艺评论上却有明确的落脚点：“明明这些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我们的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总因没有写出所谓‘本质’，即光明而被否定。”人们否定一部作品，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写出光明，而是因为

它把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成这个社会的本质写，必须清楚地区别开一个界限。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固然出现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却是封建法西斯的本性。这个本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完全敌对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有几个，那么这几个不同的本质又是由哪些人规定的呢？答案应该是共同的：人民与“四人帮”的矛盾。我们要问：在同一个对矛盾的基础上，一个统一的本质怎么会含有几个不同的本质呢？不回答这个问题占主导地位，实际上是无法判断事物的本质的。矛盾的双方总有一个谁胜谁负的问题。人民胜利了，中国的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光明的；“四人帮”篡权了，他们控制了天下就是封建法西斯的，就是阴暗的。二者必居其一，哪里会有什么“两个本质”？“本质不只有一个”的说法是未必符合辩证唯物论的。

要 注 重 我 们 的 光 明

计永佑

章。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与过去几年中以拨乱反正、揭发批判为“四人帮”为中心任务的时期已经有所差别。现在最普遍关心的字眼是“四化”，我们的人民是向前看的，因为他们有信心、有能力去创造比现在更加美好的未来。“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鲁迅语）是为了“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但是，一旦取得了光明，就要跟着光明，讴歌她，去鼓舞人民的信心。人民需要这样的歌者。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能够听到这个历史的足音，以自己的笔去反映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的。一个在光明与黑暗的分歧，在向北向前，东方未明的时候刻起，以自己的对于那黑暗势力的勇敢揭露而赢得了人民的爱戴的作家，现在更应该以满腔的热情，去谱写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与他们崇高的精神世界。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阴暗面与光明面相比较，阴暗面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题。如果大言不惭地要求我们的作家不要在阴暗面前闭上眼睛，要说什么话，那么，不可不也呼吁这些大声疾呼的人们，在这些大量的光明的事实上面，同是去写那些阴暗的，照旧讲真话？

文艺创作的主流与代表这主流的大量作品，应当与社会主义的光明本质相适应，文艺应当去讴歌规定了这本质的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光辉的业绩。阴暗面不是不可以写，但是至少要少。因为它是支流，我们

不能只强调“怎么写”而忽视“写什么”

陆贵山

炼”。我认为，凡是进入文艺作品的现象，包括“假象”、“偶然性现象”、“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都应当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现象。

李准同志认为：“一切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一切偶然中都包含着必然。”这从事物的整体和原则上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必须对偶然性现象作具体分析。我认为，笼统地说生活中的某些偶然性现象一定能反映出必然是牵强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认为脱兔中所含所有粒的数量、动物尾巴之长短等偶然性现象都必定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必然性上面，那便是一种“可憎的安慰”，这非但不能提高必然性，倒是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可见，不加分析地说的所有偶然性现象都能反映出本质是未为妥当的。严格地说，世界上没有与本质完全无关的现象，但却存在着“远离本质”的现象。“远离本质”不是“与本质无关”，“远离”和“不远离”是比较相对而言的，是用来说明现象切近本质的程度。诚然，现象是表现本质的，但不因现象表现本质的程度和深度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形象有深浅、曲直、明确、强弱、聚散的差别。有的现象浮在本质的最上面，较为零乱、模糊和淡漠，不能充分地、鲜明地、深入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相对而言，有的现象则更加切近事物的本质。

据我个人的理解，马克思指出现象和本质不能“直接合而为一”，正是表明科学的重要，恰好说明选择和提炼的重要。歌德说过：“本来的自然含有许多不重要、不合适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因为艺术的

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讨论



喜在心头

杨生录摄
(陕西吴旗县照相馆)

幸福的童年

(云南昆明春光照相馆)
曹六摄



迎来朝阳

纪洪泉摄
(天津鼎章照相馆)

月下

周云海摄
(江苏无锡向阳照相馆)

伟

程远东摄



· 4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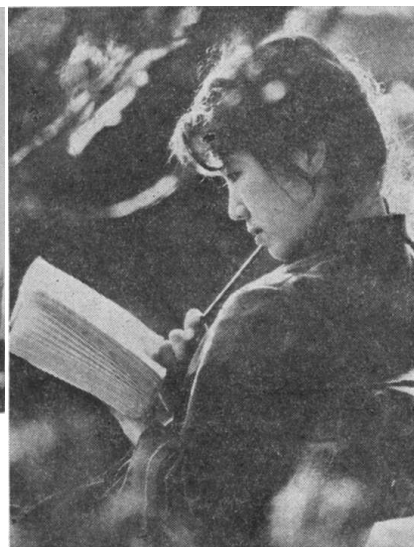


我爱海洋

唐乔明摄
(上海英姿照相馆)

渴求

狄森摄



人像摄影的新花

陈明时

在生活的道路上，人们总愿意留下自己的影像以作纪念。因此，人像摄影艺术便成为群众喜闻乐见，和人民生活联系最密切的摄影品种之一。在十年浩劫中，人像摄影艺术被糟蹋成相声《如此照相》所形容的那般光景。今天，人像摄影师、摄影家们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他们满腔热情地钻研技艺，努力反映

人民的精神面貌，创造出人像摄影艺术的朵朵新花，为我们充满着阳光的生活增添了情趣。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人像摄影艺术展览”，是十年浩劫以后的首次大型人像影展。它用将近400幅作品，介绍了照相馆业和其他摄影工作者的人像摄影艺术成果。这次的展出，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各种技术技巧得到较好的发挥。不少作品形神兼备，生动自然，受到人们的好评。

人像摄影的对象是人，人像摄影艺术家应该尽量研究、了解和熟悉他们。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光线的运用、角度、时机的选择以及制作等摄影艺术手段，把人物的性格特征、精神状态反映出来。这样才能产生成功的作品。这样的人像作品，并不是人物的简单纪录，而是一件艺术品。它可以陶冶人们的精神，给人以美的感染。

形式美是任何艺术创作都得认真注意的，人像摄影艺术的种种形象塑造、性格刻画都离不开对形式美的研讨。但是，单纯追求形式的作法则是不足取的。文以载道，形以传神，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就会显得单薄、浮浅了。

这次人像摄影艺术展览，将推动照相馆业和其他摄影工作者的创作活动，使人像摄影艺术得到更大的提高。

華潤公司

本公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
本公司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信誉卓著，业务关系遍及港九、东南亚以至世界各地。

地址：香港湾仔高士打道湾景中心大厦 电话：5-7569111 (40线)
邮政信箱：“2051”或“1209” H.K. 电报挂号：“CIRECO”或“0230” H.K. 电传号码：73277 CIREC HX
本公司内地通信地址：广州市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第四办公室或广东省深圳市011信箱，电报挂号0230 (深圳)

热诚欢迎港九和海外工商界人士与我公司洽谈、联系业务，发展贸易，增进友谊。

热烈欢迎内地凡经批准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向我公司联系、委托进出口业务，咨询香港市场情况和客户资信，我公司服务周到，收费低廉。

本公司内设有四个业务部

机械仪器部：

代理、经营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中
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和中国技术
进口公司的业务
电报挂号：“CIRIMP”或“5479”
H.K.
电传号码：73277 CIREC HX

五金矿产部：

代理、经营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
公司的业务
电报挂号：“MINERALS”或
“7006” H.K.
电传号码：61260 “MIMET”
HX

石油化工部：

代理、经营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
的业务
电报挂号：“CIRECHEM”或
“7307” H.K.
电传号码：65053 “CIREO”
HX

进口部

代理、经营中国各进出口公司和
有关部门委托的进口业务
电报挂号：“CIRECO”或
“0230” H.K.
电传号码：73277 “CIREC”
HX

以下公司分别是有关进出口公司及其他外贸企业的代理

五丰行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
香港代理
电报挂号：“NGFUNG”或
“3578” H.K.
电传号码：74054 NGFUNG HX或
65227 NGFUNG HX

德信行有限公司

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
香港代理
电报挂号：“STILLON”或
“4848” H.K.
电传号码：63738 TESO HX

华远公司

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
香港代理
电报挂号：“HYCOMP”或
“6678” H.K.
电传号码：61231 HYCOMP HX

中艺(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香港代理
电报挂号：“CACAGENT”
或“5669” H.K.
电传号码：64199 CACHK HX

华润纺织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香港代理
电报挂号：“CIREXP”或“3387”
H.K.
电传号码：63383 CIRET HX

华夏企业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及中国租
船公司香港代理
电报挂号：“FARENCO”或
“6651” H.K.
电传号码：73333 FAREN HX

中国广告公司

一、办理中国出口商品各种广告业务 二、设有陈列馆，承办各项展览业务及出租展场 三、代办香港地区客户在中国的广告业务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星光行三楼 电话：3-672975 3-679230 3-672971 3-672981 电报挂号：“CHINADVAGT”或“1693” H.K.